

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家庭策略

——基于家庭生态理论的分析

张佳伟,滕诗琪,刘 娴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围绕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对 17 个流动家庭进行资料收集,发现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有留守或随迁两种策略,其中选择留守的家庭包括分离的主干家庭和分离的核心家庭两类,选择随迁的家庭包括流动的核心家庭、分离的主干家庭和流动的主干家庭三类。基于家庭生态理论框架,从人口特征、环境因素和组织信息等三个方面对流动家庭的家庭策略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留守类家庭虽然在就学地选择上倾向于随迁,但本着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原则,最终做出子女留守的决策;随迁类家庭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以实现社会流动,虽然他们也面临着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但考虑到家庭团聚及城乡教育差距,最终做出子女随迁的决策。

关键词:流动家庭;就学地选择;家庭策略;家庭生态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5;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3)03-0040-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

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国家发展公平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过程中,流动人口子女这一特殊群体是其中一个薄弱且重要的环节。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3.76 亿人,较 2019 年增加 1.4 亿,其中长期居留的流动

收稿日期:2022-10-18

基金项目:2021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流动儿童学情追踪与政策回应机制研究”(21JYB019);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轨迹及教育支持体系研究”(KYCX22_3172)

作者简介:张佳伟(1981—),通讯作者,女,山西大同人,苏州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与社会学、教师教育。

滕诗琪(1997—),女,湖南湘西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刘娴(2001—),女,江苏淮安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师范)专业 2020 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教育公平与政策。

人口上升,居留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1]。因此,流动家庭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其就学地选择也成为影响家庭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在权衡利弊后无论是选择让孩子跟随自己到城市就读或是留在老家就读都是一种理性分析后的结果,这种教育选择也被视为流动人口的一种家庭策略^[2]。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一方面,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倾斜支持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学校建设工程、“全面改薄”、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项目^[3],这些政策使得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改善。另一方面,加大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机会的力度,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随迁子女就学“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随后,许多城市相继推出“积分入学”政策,为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难”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那么,流动人口在子女“老家入学”和“随迁入学”之间会如何权衡呢?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从微观的家庭策略的角度分析流动人口在为其子女做就学地选择时的家庭策略,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博弈进行探讨,分析不同家庭的价值取向差异以及各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发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下的家庭决策。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的研究,学者大都采用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范式,注重对流动家庭的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研究显示,流动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长的职业类型、父母的教育期望、城

乡结构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排斥、家长自身的城市适应状况、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等因素,都会对流动家庭的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4-9]。以上研究缺乏对流动家庭成员的价值博弈过程的深度描述和解释。而考察他们的价值博弈过程,可以帮助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性质,进而分析家庭对社会的影响^[10]。另外,有研究者基于结构二重性理论对流动农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流动人口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行动不仅是出于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理性选择,也并非教育陷入政策阻碍造成的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性过程^[11]。这一理论研究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从家庭生态理论视角对其中的家庭策略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一概念来自对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10]。蒂莉(Louise A. Tilly)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用来指导家庭成员解决家庭问题的隐性规则,用来处理移民、生育、教育、家庭劳动力参与,甚至结婚年龄等问题^[12]。20世纪发展起来的较为成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或视角),如:家庭生态理论、生命历程研究和家庭危机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涉及家庭策略。家庭生态理论(Family Ecology Theory)将人类发展和家庭关系整合在一个家庭资源管理框架内,研究家庭及与家庭相关的各种环境的广泛问题,包括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外部系统、家庭成员个人及整个家庭^[13]。布鲁斯(Beatrice Paolucci)是家庭生态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生命支持系统,既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支持,也依赖社会环境提供的与人的行为和生命质量相关的心理支持。她关注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并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影响家庭决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邓肯(Otis Dudley

Ducan)的生态复合体模型,她提出,家庭生态系统由人口特征(Population,指个体家庭成员)、环境因素(Environment,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和组织信息(Organization,指沟通和控制组织,通过对信息的运用将能量转化为家庭的决策和行动)三个部分组成^[14]。因此,运用家庭生态理论来探究和分析流动家庭在各种社会性结构条件的限制下,如何对其子女就学地进行家庭决策,具有很强的适切性。现有家庭生态理论的研究,涉及了心理学、医学、住房等领域,但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进行研究的较少。黄孙晋(Sun-Jin Hwang)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家庭生态学理论,对韩国家庭的女性青少年学校服装选择这一家庭决策进行了研究^[15]。目前,学者们对流动家庭教育选择中的家庭策略研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初中后教育选择^[16]以及小学升初中的教育选择^[17]上,对于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家庭的就学地选择策略研究较少。就学地选择是流动家庭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对成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这一周期的流动家庭往往会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通过整合自身的家庭资源,做出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流动策略。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中的家庭策略进行分析。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中的流动人口子女特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第一轮访谈,以流入地为江苏、广东等地的17个家庭作为访谈对象。这17个家庭包括5个留守家庭、12个随迁家庭。在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围绕“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还是带在身边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不

同的家庭成员对孩子就学地选择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等问题,请受访者畅所欲言。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本研究从家庭结构的角度,基于就学地选择的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留守家庭或随迁家庭,并进一步细分为五种家庭类型。其中,留守家庭包括分离的主干家庭和分离的核心家庭;随迁家庭包括流动的核心家庭、分离的主干家庭和流动的主干家庭。基于家庭生态理论的视角,采用布鲁斯提出的理论框架,在上述五种类型中各选取一个典型个案家庭,从人口特征、环境因素和组织信息三个方面,探究流动家庭在社会宏观结构的限制下,试图使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家庭策略。

四、研究结果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如“落叶归根”“家庭团圆”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阻碍,家庭化迁居模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包括举家迁居、部分迁居、迁居后回流等多种方式^[18]。

(一)留守家庭及其家庭策略

1. 人口特征:分离的家庭类型。(1)分离的主干家庭。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农村种植业的衰落和城乡体制的持续改革,在拥有两代以上夫妻的主干家庭中,许多年轻一代夫妻外出打工,而年长夫妻则留守家中务农,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由年长夫妻(通常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因此,主干家庭呈现出家庭成员分离的状态,形成分离的主干家庭。

14岁男孩小张^①,是湖南湘西人,就读初中一年级。小张的爸爸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到江苏无锡打工。小张的妈妈在模具厂

^①本研究中出现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上班,爸爸在钢管厂上班,小张跟着70多岁的爷爷奶奶在湖南老家生活。(个案1)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小张说:“我肯定想跟爸妈待在一起。小时候还会问他们能不能带我一起走,但现在长大了,认清现实了,不会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小张妈妈也表示:“舍不得孩子,想把孩子带在身边,让他到城里上学。”尽管小张和父母的意愿都是随迁,但是受父母的工作特点和社会保障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最终做出了子女留守的决策。

(2)分离的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主要是指由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与城市家庭主要由核心家庭构成一样,农村家庭的主导模式也是核心家庭^[19]。流动家庭中的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家庭一般会重新进行角色分工,以实现子女教育最优化和家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重新分工的过程中,男性大都选择外出务工赚钱,女性大都选择留守老家照顾上学的孩子,所以妻子选择留守的核心家庭比例较大。

11岁男孩小郑,是湖北黄冈人,就读小学四年级,老家在农村。小郑的妈妈带着小郑在老家的县城租房,陪他在县城读书。小郑的爸爸辗转过好几个城市,现在在山东淄博的模具厂打工。(个案5)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小郑说道:“我想去爸爸打工的地方上学,我还没去过大城市呢。”小郑的妈妈表示:“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想把孩子带到老公打工的地方上学,让一家人团聚。”但是由于到大城市上学开销太大,再加上小郑爸爸比较爱自由,工作变动频繁,因而该家庭出于对各种综合因素的考虑,选择了子女留守且妻子租房陪读的家庭策略。

2. 环境因素:各种家庭资源和宏观社会条件限制。布鲁斯将家庭概念化为一个生命支持系统,这个系统既依靠自然环境维持物质生活,也依靠社会环境实现人性化。宏观的社会环境与

微观的家庭决策之间相互依赖。社会环境对家庭内部的决策产生影响,而家庭又通过其消费模式和社会化实践来反作用于社会^[13]。对于选择留守的流动家庭来说,环境中各种家庭资源和宏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是其做出最终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研究发现,留守类家庭的就学地决策主要受家庭经济条件、流动人口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和进城读书的高昂成本是流动家庭不得不考虑的要素。访谈中,小郑妈妈谈道:“我老公赚钱也不是很厉害,把孩子带到广州上学开销太大了,负担不起。”(个案5,小郑妈妈)二是流动人口工作性质。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对技能要求较低,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和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等现代服务业^[20]。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日常的吃穿住行、家庭作业辅导等都需要成人付出相应的精力。但他们的父母往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腾出时间照顾孩子。这也是流动家庭在进行家庭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限制性因素。受访者小张妈妈表示:“我跟我老公的工作时间都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需要进行白班和夜班两班倒,没有时间照顾他。”(个案1,小张妈妈)三是流动人口高流动性的特点。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条件,但大部分流动人口就业流动频繁。有研究显示,他们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平均工龄约为3年^[21]。在个案5小郑的家庭中,小郑父亲的高流动性是其最终选择让子女留守的重要因素。“我比较爱自由吧,在一个地方待腻了或者工作不顺心了就想换个地方。出来打工这些年,平均三四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拖家带口的也不方便。”(个案5,小郑父亲)四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

依然不足,主要体现在政策欠缺、不同社会保障系统之间难以接续、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执行不力和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等^[22]方面。在城市缴纳社保是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基础。因此,社会保障是将许多流动人口子女拦在城市外的重要因素。受访者小张爸爸表示:“我们厂里没给我们交社保,带孩子过来的话,一年得自己交一万多的社保,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个案1,小张爸爸)

3. 组织信息:综合诸因素,做出子女留守的家庭决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为了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许多主干家庭做出了年轻夫妻外出务工、年长夫妻在家务农和照顾孙辈的决策,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23]。在这一模式中,隔代抚育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主要教育方式。但是父母抚养和培育角色弱化,祖辈主要教养人年龄较大、知识水平有限、过度溺爱等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24],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流动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期望不断提高,父母教育卷入^[25]的意愿不断加强。从就学地的选择上看,几乎所有流动家庭的成员都倾向于随迁。但是与孩子单纯受情感因素影响的价值取向不同,父母在其子女就学地选择中会综合考量环境等因素,最终形成相对理性的价值取向。在选择留守的家庭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影响其就学地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受访者小张妈妈表示:“老家这边工资太低了,我出去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供孩子读书和给家里盖房子。虽然内心很想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为了赚钱和存钱也只能克服”。(个案1,小张妈妈)因此,留守类家庭面对各种环境限制,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降低家庭生存风险的考虑,选择让子女留守的家庭策略。虽然也有一些家庭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选择由妻子留守照顾子女,但核心成员的外出也损害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家庭情感功能的弱化和

教育功能的受损,对儿童的发展和教育产生不良影响^[26]。综上所述,流动家庭实现理想的家庭教育仍面临着重重困境。

(二) 随迁家庭及其家庭策略

1. 人口特征:流动的家庭类型。(1)流动的核心家庭。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也相对提高,逐渐树立了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目标。因此,围绕这个家庭发展目标,流动夫妻会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实现整个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形成流动的核心家庭。

12岁女孩小葛,就读小学五年级,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姐妹俩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长大,上完一年级后一起转学到爸妈打工的地方。小葛的爸爸在工地上干活;妈妈做家政,一般工作到下午三点多就回家做家务并接孩子放学。(个案7,小葛)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一家人均选择随迁。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是小葛父母选择让姐妹俩在小时候留守的重要原因。小葛爸爸说:“姐妹俩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穷啊。那时候老家工业也不发达,我们没办法就出来打工了,出来赚钱就没办法带着孩子了。”在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对教育的重视使得该家庭对之前的决策进行重新审视并调整,最终做出了举家迁移的决策。

(2)分离的主干家庭。在一个拥有两代以上夫妻的主干家庭中,随着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家庭成员会一起迁入城市,只有个别家庭成员留在老家,这一家庭决策形成了分离的主干家庭。

10岁女孩小戴,老家在安徽寿县,在苏州市一所民办外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小学四年级,有一个妹妹。小戴在三年级以前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上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小戴和妹妹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妈妈是财务工作人员,爸

爸是工程师,小戴的奶奶在苏州照顾小孩,爷爷在家务农。(个案9,小戴)

在个案9中,小戴的爸爸在她三年级以前一直生病,小戴妈妈在城市里既要工作,又要照顾生病的爸爸。无法照顾孩子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家庭做出让她在老家上学的策略。小戴三年级的时候,爸爸身体好了一点,妈妈就提出把小戴和妹妹带到打工地的想法。但是爸爸妈妈工作都比较忙且都不想放弃工作,因此这一家庭做出了让小戴的奶奶过来照顾孩子,小戴的爷爷在家务农的决策。小戴的奶奶说:“我儿子跟我说的时侯,我内心肯定是不想去的,我在老家待了大半辈子了。但是我儿子儿媳也很难,我们该帮的还是得帮。”经小戴的奶奶同意后,小戴的才把要给小戴转学的消息告诉她,小戴的妈妈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家里蹦了好久。”

(3)流动的主干家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拥有两代农民工的主干家庭举家外出,共同生活在迁入地城市,形成流动的主干家庭。他们在面临学龄期孩子就学地选择的问题时,出于家庭稳定性的考量,往往选择让小孩在流入地就学,并选择让一位女性家庭成员放弃工作照顾小孩。

15岁女孩小邓,在苏州市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初中一年级。她的老家在河南信阳,她现在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一个不到两岁的弟弟,一起在苏州生活。小邓的妈妈是服装厂工人,爸爸和爷爷都是机械厂的工人,奶奶在家里带弟弟,并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个案10,小邓)

在个案10中,小邓的妈妈说:“可能除了没有苏州的房子,户口不在苏州,我们家孩子在精神上可能跟苏州人也没什么区别,老家对她来说反而更加陌生。”小邓小学和幼儿园入学都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到初中时,小邓一家受到

了流入地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的限制。苏州市的流动人口入学积分要求达到215分,但是他们只有132分,没有达到苏州市积分入学的要求。当时一家人就面临回老家或者想办法留在苏州上学的抉择。小戴的小学老师给她推荐了三所私立学校,其中两所的学费要两三万一年(小邓家庭难以负担),还有一所是她现在就读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小邓的爸爸表示:“现在读的这个学校,教学质量肯定是比不上公办的,学费也不低,但是这已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2. 环境因素:乡村教育发展的不足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的限制。近些年来,我国围绕义务教育经费、校舍建设、教师队伍、学校布局等方面,不断进行政策与制度创新,继续巩固和提高农村教育发展水平^[27]。经过多年的努力,农村教育在规模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与局限。比如,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数量短缺、师资流失严重、队伍老龄化问题严峻、教师工作负担繁重、专业素质较低且专业发展受到制约等问题,导致乡村教师队伍现状堪忧^[28]。在个案7小葛家庭中,小葛的妈妈说:“孩子们在老家上一年级的时侯,问她们什么都不会,她们每天脏兮兮的,我真的担心得整晚睡不着。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把孩子接过来,不管多穷多苦都要带在自己身边。”个案9中的小戴妈妈说:“老家村里的小学教学质量很差,学校的老师都是教过我的老教师,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就十来个人,好多东西都不教,小学一到六年级没有教过英语。”孩子留守农村后的隔代抚养弊端以及城乡间教育质量的差异是随迁家庭改变子女留守决策,继而让子女转入城市读书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出台了多种政策来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机会公平。如在“两为主”的基础上提出

了“两纳入”政策,即“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12年发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提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的要求。但是,中央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各城市争相引进高学历、高技能流动人口的各项政策,也导致了流动人口群体内部不同人群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29]。有研究表明,事实上,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面临着“门槛过高”、限于“局部开放”等问题^[30]。因此,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随迁入学以及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种种限制。

3. 组织信息:综合诸因素,做出子女随迁的家庭决策。社会学家认为,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先赋性因素,即与生俱来的父辈的家庭资本等;二是后致性因素,即通过个人后天努力获得的财富和能力等。西方学者就先赋性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进行了许多论述,美国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对应理论”,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先赋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将这种不平等结构从父辈转移到子辈。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提出的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从文化生产的机制对这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了印证。近年来,关于我国频发的农村学校欺凌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31]、留守儿童^[32]遭受欺凌和实施欺凌的风险均更高。这种类型的“反学校文化”也体现了同伴群体文化生产与学校教育制度交织下的“权利不对等”,进而阻碍了部分底层青少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33]。上述的种种研究似乎表明,通过教育难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

但是,教育作为实现阶层流动的后致性因素的一种,在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哈维赫斯特(R. J. Havighurst)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工业民主社会将会更加地开放和流动化,教育将成为个人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欠缺教育或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人向下社会流动的主因。”^[34]流动家庭作为社会上相对弱勢的群体,教育是他們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选择子女流动的家庭中,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家庭目标是其做出家庭决策的至关重要因素。“我们辛苦一辈子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孩子嘛!小孩子的读书现在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个案11,小韩的爸爸)“我跟他爸爸两家都是世世代代的老农民,我们是过惯了苦日子,所以都不想让儿子再像我们一样,我们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老话,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出人头地。”(个案15,小武的妈妈)在这一发展目标的指引下,选择随迁的家庭,往往会对孩子的教育给予更高的期望、付出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调整,以实现这一家庭目标。

五、结论与启示

家庭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各种社会性结构和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流动家庭中家庭成员的价值博弈最终形成了家庭的价值目标,成为家庭决策的基础。最后的决策达成不仅来自价值观和目标的协调,还要受限于每种行动方式所涉及的资源^[11]。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开始意识到子女随迁的重要性。他们重视子女教育,有较强的家庭教育参与意愿,希望通过孩子的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资源、乡村教育的发展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等环境因素又影响着流动家庭的策

略和抉择。

流动家庭作为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大都从事着艰苦且基本福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工作。但他们无论是选择留守还是随迁,都对孩子表现出了很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在能抵抗家庭风险的前提下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望孩子能成为“读书的料”,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就学地选择是流动家庭的博弈,更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博弈。如何在制度设计上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给他们更多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化的角度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结果优于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促进其健康发展^[35-36]。本研究发现,无论最终是选择留守还是选择随迁的流动家庭,其就学地选择的意愿均是让子女随迁入学。但是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社会保障等因素的限制,有些家庭只能做出留守的决策。

基于研究发现,建议加大对“两为主”政策执行的监督,保障随迁子女异地升学机会。研究发现,各地在“两为主”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条件和准入门槛。此外,小学的入学要求和初中的入学要求不一样,导致出现了许多在流入地公办学校上小学但到了升初中时,因不符合条件只能选择民办学校或者回老家的情况。因此,应加大对“两为主”政策的保障力度,同时加强积分入学等政策的前期宣传和引导,让随迁子女家庭有更充分的准备。针对北京、天津、上海的异地中考限制条件较多,东部地区、华南地区的教育资源紧张、教育供需矛盾较大等问题^[37],应该对流入人口多的城市予以财政倾斜,进一步放宽随迁子女异地中考的限制。

六、研究局限与展望

以往的研究者以家庭亲属结构为基础对家庭类型进行划分,依据家庭代际数量和亲属关系的不同,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及其他家庭等^[38]。本研究仅分析了常见的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对联合家庭、重组家庭及单亲家庭的探讨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优化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 [1] 盛亦男.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 [J]. 人口研究, 2013(4): 66-79.
- [2] 尚伟伟. 流动人口对其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选择的实证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 [J]. 教育科学, 2016(3): 74-82.
- [3] 陈宝生. 中国教育:波澜壮阔四十年 [J]. 人民日报, 2018-12-17(11).
- [4] 刘成斌, 郑志华. 心有余而力不足?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选择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7(7): 17-18+32.
- [5] 马国庆. 北京市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期望和教育选择研究 [D].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 [6] 许召元, 高颖, 任婧玲. 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6): 12-21+80.
- [7] 徐传新, 张登国. 流动还是留守:家长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10): 52-55+51.
- [8] 杨倩胜辉. 杭州市进城务工家庭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9] 张晖. 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研究 [D]. 兰州:甘肃农业大学, 2019.
- [10] 樊欢欢. 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 [J]. 社会学研究, 2000(5): 100-105.
- [11] 李芬, 慈勤英. 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

- 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 [J]. 青年研究, 2003 (12): 13-19.
- [12] LOUISE A T. Individual liv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the French proletariat [J].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979(2):137-152.
- [13] BUBOIZ M M, SONTAG M S. Human ecology theory [M] //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New York: Spring New York, 1993:419-426.
- [14] NANCY C H, PAOLUCCI B. The family as an ecosystem [J].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1970 (5):315-318.
- [15] HWANG S J. Female adolescent clothing selection in Korea: a family ecological analysis[D]. 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88.
- [16] 文旻. “隐性抗争”还是“隐性合谋”——上海市流动人口家庭初中后教育选择的家庭策略互动模式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0.
- [17] 李琴. 流动儿童家庭的家庭策略研究——以昆明市流动儿童家庭小学升初中的教育选择为例 [D]. 昆明:云南大学, 2012.
- [18] 盛亦男. 中国的家庭化迁居模式 [J]. 人口研究, 2014(3): 41-54.
- [19] 罗小锋. 跨地域家庭:流动过程中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与建构逻辑 [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85-93.
- [20] 刘振, 戚伟, 刘盛和, 等.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分异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6):1055-1068.
- [21] 白南生, 李靖.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8(7): 70-76.
- [22] 成前.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与对策 [N]. 中国人口报, 2019-10-21(3).
- [23] 田舒彦. 县域城市化中新生代农民的家计升级与家庭分化——基于农民工家庭的新“半工半耕”结构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7): 15-22.
- [24] 蒋合涛, 罗充, 程敏. 家校合作是解决农村隔代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4): 101.
- [25] RACHEL S.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 ecology perspective [J]. Parenting, 2006 (1):1-48.
- [26] 吕吉, 刘亮.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及其影响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1(10): 59-62.
- [27] 李清臣, 晋银峰. 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变迁、趋向与启示——以2005—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依据 [J]. 郑州师范教育, 2020(1):16-22.
- [28] 庞丽娟, 金志峰, 杨晓敏. 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队伍建设政策研究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5): 109-113.
- [29] 王洛忠, 徐敬杰, 闫倩倩.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政策研究——基于18个城市政策文本的分析 [J]. 学习与探索, 2020(3):23-31 + 174.
- [30] 张珊珊. 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问题探寻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5(9):12-15 + 20.
- [31] 祝玉红, 杨晶晶. 流动儿童校园欺凌伤害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A打工学校为例 [J]. 社会建设, 2019(2):48-59.
- [32] 胡咏梅, 李佳哲. 谁在受欺凌? ——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研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171-185.
- [33] 杨梨, 王曦影. 农村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群体文化与底层再生产 [J]. 教育学报, 2021(4):133-147.
- [34] 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68.
- [35] 王水珍, 刘成斌. 流动与留守——从社会化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选择 [J]. 青年研究, 2007(1):22-30.
- [36] 刘成斌, 吴新慧. 流动好? 留守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比较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7(7):5-9.
- [37] 李红娟, 宁颖丹. 异地中考政策的区域差异及思考——基于60个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20(1):29-34.
- [38] 马景荣. 婚姻与家庭 [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2:26-28.

(责任编辑:张文婷)